

我对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質的几点意見

王 承 仁

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规模农民运动。关于这一伟大革命运动的性質問題，目前史学界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意見。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种：（一）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单纯农民战争，（二）是资产阶级性农民革命，（三）既是单纯农民战争而同时又带有资产阶级性質。另外，还有人这样说：“太平天国从其革命的动力和斗争方式来说是单纯农民战争而具有某些资本主义因素，从其社会内容来说，其根本性質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①。虽然作者說他是同意上述第三种意見，但实际上他却采取上述第二种意見来处理。

其所以产生上述那些分歧的意見，固然一方面是由于目前史学界对这个时期的很多重大問題还没有一致的認識。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們沒有很好地掌握毛澤东同志指示的关于革命性質的理論原則：“只有認清中国社会的性質，才能認清中国革命的对象，中国革命的任务，中国革命的动力，中国革命的性質，中国革命的前途和轉变。所以，認清中国社会的性質，就是說，認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認清一切革命問題的基本的根据”^②。对这些問題，我愿提出自己粗淺的看法，希望史学界同志們批評指正。

一、关于革命前夕中國的國情和革命的基本动力問題

鴉片战争前夕，由于长期的剧烈的土地兼并和苛重的封建剥削所造成的广大农民的破产，土地集中的现象这时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鴉片战争后，清朝封建统治者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訂立了一系列的卖国条约，他們开始取得了侵略中国的特权。大量的軍費开支和“赔款”，可恥的鴉片泛滥和外国商品輸入的激增，造成了白銀繼續大量外流，使得当时中国财政上和国民經济上銀貴錢賤的問題更加严重了。腐朽的封建統治階級將这一切負担都轉加在人民的身上，弄得“旧捐稅更加繁重而难以担負，旧捐稅外又加上新捐稅”^③。人民更加无法生活。已經严重的土地兼并这时更为加剧了，有人根据冀，苏，浙，晉，鄂，魯，豫，贛，閩，桂，粵，及东北地区等十四省土地佔有情况的分析，估計在太平天国革命前夕全国的土地，約有百分之四十到八十集中在百分之三十至十的少数人手中，百分之六十到九十的人沒有或仅有少量的土地”^④。当时中国社会还仅仅是处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阶段，

① “理論战线”一九五八年二期頁七八。

② “毛澤东选集”（普及版）第二卷頁六二七。

③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頁四二。

④ 王瑛：“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問題”（中山文化教育季刊第三卷第一期）。

缺乏大量購買自由劳动力的場所，这种情况决定 了广大农民在失去土地后， 虽然有很少一部分进入到資本主义剝削性質的工农业生产部門， 从事僱佣劳动， 成为近代无产階級的前身， 但絕大部分的破产农民則不能不依旧附着于土地， 在封建地主的威力下， 过着苦痛的生活。他們把仅有的小块 土地卖了， 又在这块土地上做佃农：“旧时有田之人， 今俱为佃耕之戶”^①，“刘谷位将水田三亩六分卖与袁麒、仍是刘谷位佃种”^②。他們除了向地主交納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地租外， 还要向地主繳納各种額外需索。他們随时有被地主夺佃退佃的威脅， 为了偿付欠租并 繼續佃得一块土地，“往往雞豚布帛， 无不搜索准折， 甚至有卖男鬻女以偿租者。此等风气， 大概皆然”^③。地主对佃戶則有随便打罵和搶佔的特权，“訪聞每于岁暮封印之后， 差遣悍僕豪奴分头四出， 如虎如狼， 逼取租債， 举其室中所有， 搜括一空， 甚而掀瓦撥門， 拴妻縛子， 又甚将本人鎖押私家， 百般吊打”^④。有些地主“擅將佃戶为僕， 恣行役使， 过索租粒， 盘算磊利， 甚有呼其妇女至家服役， 佃戶不敢不从者。且有佃戶死亡， 欺其本宗无人， 遂卖嫁其妻若子， 并收其家資者”^⑤。佃农們一旦被迫退佃， 就失掉了一切依靠， 他們当中一部分人淪为僱农， 过着更悲惨的命运。他們所受的封建榨取比佃农更为严重。“近見湖南人情澆薄， 以强欺弱， 往往有本屬僱工， 配以婢女， 限滿不許归宗， 仍行霸留者。偶而挈妇言归， 輒即指为逃奴叛僕， 輾轉兴訟”^⑥。在法律上雇工反抗地主及其親屬的欺压， 加等治罪。还有一些破产农民， 逃入荒山开垦， 但是他們自己缺乏資金， 仍不能不被人“招佃”， 重新开始他們的农奴生活。即使是自力开垦的土地， 也免不了封建政权对开垦地的新賦开征。試看道光二十一年(1941)十二月辛己的“上諭”：“打牲烏拉淳水泉封禁官荒隙地， 前經降旨， 严查奸民潛入搭棚开垦。茲据該署將軍等查有民人李永发， 在封堆外侵占官荒六千一百五十余垧， 招佃开垦。……又民人王梦基在封堆外侵占官荒一千一百垧， 招佃开垦。……越界开垦， 久干例禁， 叠經降旨飭查， 何以仍有李永发等私垦地亩之事？”^⑦从这記載， 可見王朝“严查「奸民」潛入搭棚开垦”的“封禁官荒隙地”， 已不能阻止丧失了土地的劳动人民来此垦殖， 然而他們却被地主（如李永发、王梦基）“招佃开垦”， 农民們始終逃不出原来的命运。又如道光二十七八年間(1847-48)的“实录”記載：道光二十七年十月庚申“戶部議准广西巡撫郑祖琛疏報：‘天保县开垦水田八埤一伯， 照例升科’， 从之”；道光二十八年七月丁丑“戶部議准直隶总督訥尔經額疏報：‘武清县、薊州开垦地九十三頃八十一亩， 照例刊科’， 从之”；同年七月甲午， 戶部議准陝甘总督布彥泰疏報：“甘肃清远县开垦地二十九頃三十一亩有奇， 照例升科”， 从之”^⑧。这三条資料告訴我

① 楊錫紱：“陈明米貴之由疏”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九頁八。

② 中国近代农业史資料第一輯頁一〇五。

③ 中国近代农业史資料第一輯頁八一。

④ 全上註。这两条都是鴉片战前的資料。太平天国革命前夕， 这种情况基本上只有加甚， 沒有減輕。

⑤ 长沙县志：同治， 卷二〇頁二一。

⑥ 长沙县志卷二〇頁二一。

⑦ 清宣宗实录卷三四三， 頁一八。

⑧ 分見清宣宗实录卷四四八， 頁一五；卷四五七， 頁七；卷四五七， 頁一九。

們，即使是开垦的土地面积很小，清王朝統治者也决不迟緩“照例升科”的田賦剝削。农民們流亡到远处开垦荒地，被統治者作为“奸民”来看待，或被污蔑为“盜賊”并加以驅逐。未被驅逐的“一体按戶編排，注明佃种棚居年分，按十戶設立牌长，十牌設立棚长，合一山設立棚头”^①，以便对他們进行殘酷的統治。这些情况表明：地主对佃戶及僱工的关系是政治上压迫經濟上剝削的关系，是封建等級的貴賤关系。丧失了土地的农民，远走他处开荒垦殖，也只贏得佃农生活的恢复，实际上始終成为地主压榨下的农奴。因此我們認為，当时农村的两极分化，不是什么資本主义性質的，而仍然是封建制度范围内的土地兼并和剝削关系的问题。因为千百万农民失去的土地，仍然集中在封建地主手中，他們利用这些土地仍然是从事封建的租佃剝削。广大农民破产后由于社会条件的限制，沒有新的出路可找，在生活的压力下，他們不得不依然附着于土地，忍受着殘酷的封建压榨。这种情况决定了当时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其它矛盾只能是次要的从屬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就是在这个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李秀成在他的自傳中指出：“数县之人，十家之中，或有三五家肯从，或十家八家肯从，亦有讀書明白之士子不从；从者俱是农夫之家，寒苦之家，积多結成聚众”。接着又說：“团練与拜上帝之人两有区别。拜上帝人与拜上帝人一夥，团練与团練一夥，各自爭气，各自逞强，因而逼起。起义之时，团練与拜上帝之人同村，亦有一村逼一村，故而聚集”^②。現时金田村的老人也說：“参加拜上帝会的农民居多，組織团練的都是些有錢的人。他們都是互相仇杀的。当时的农民都傾向拜上帝会，有功名有錢的人才拥护清朝”^③。这些資料如实地反映和描繪了当时阶级斗争的基本情况，革命的基本队伍是农民，斗争的主要矛头是針對着地主阶级及其封建統治秩序。

但是当时的中国，已經不是一个單純的完整的封建国家。鴉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的母胎中已經孕育了資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經濟也比清初有了很大的发展，个别地区农业的开始采用資本主义經營也已显露。这些情况表明了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它的末期阶段。鴉片战争后，資本主义侵略者打开了侵略我国的大門，商品大量輸入，加速了中国封建經濟的解体过程。这时的中国已經由一个封建社会开始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了。这种情况决定了当时中国具有着过去所不曾有的特点，即外国資本主义已經开始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敌人，客观历史条件决定了太平天国革命不能是單純的反封建斗争，而是要担负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任务。太平天国的英雄們这样做了，并且做得很出色。但由于这时資本主义的侵略还是处在开始阶段，其侵略尚不如以后那样的深入，这种情况决定了当时革命斗争的主要矛头是对准国内封建統治阶级，不是資本主义侵略者。其二，由于当时中国是处在封建末期阶段，資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經出現，也有了一定数量的新阶层出現，这个阶层特别是其中的萌芽无产分子，因为同样的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榨，反封建压迫和剝削是他們所要求的，因而他們能够参加太平天国革命并成为革命基本队伍的一部分，龙山矿工及湖南煤矿工人的积极参加并在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就明显地說明了这个问题。

目前有的历史工作者由于誇大了当时中国社会經濟的发展；他們将当时农村中由于土地

① 清宣宗实录卷二八六。

② 中国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国第二冊頁七八七。

③ 太平天国起义調查报告：頁四八。

高度集中所形成的两极分化，看作是資本主义性質的，因此提出了“由于分化，农民不再是稳定的階級，从某种意义上講，它不成其为一个階級了”，并进一步指出这时农民所受的压榨“具有非封建性質，多半脫离了封建束縛，……他們已不是某某老爷和某某太太的农民，人身束縛和超經濟强制已开始退色和不中用了”。并說太平天国革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力量是“萌芽无产階級分子”^①。从这个論点看来，似乎太平天国革命是“萌芽无产階級分子”领导的革命。这些論点是与这次革命的史实不符的。这时的农民仍然是受着封建地主階級殘酷的經濟剝削和政治压迫，他們与中世紀农民没有什么根本差別。因此，我們認為将这时的农民說成“不再是一个階級了”的論点是錯誤的。我們的意見是：这时的农民不仅仍然是一个階級，而且是当时社会最基本的階級。

我們也承認，当时的中国确实已有“萌芽无产階級分子”，他們在太平天国革命中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这时的“萌芽无产階級分子”的数量是不多的，沒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他們参加革命只是作为革命的追隨者，而不是也不可能是革命的領導者。同时他們中的絕大部分还没有与农业完全分离，沒有褪掉农民的性格。因此，如恩格斯所指出：“这个階級的大部分，即住在城市的大部分，依然保存着农民性質显著的特征”^②。列宁同志又指出：“在資本主义发展的低級形式下，……零散的单独的小規模的剝削把劳动者束縛于一个地点，使他們彼此隔絕，使他們无法理解自己階級的一致性，使他們无法統一起来”^③。从經典作家的指示和我們具体的对太平天国革命中萌芽无产階級分子所起作用的分析，我們認為将它的作用过份的渲染是不正确的。将它說成是这次革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力量，就更不符合实际的历史情况了。

很多同志提出太平天国革命的基本队伍和核心力量是“萌芽无产階級分子”，其中很主要的是強調燒炭工人是“萌芽无产階級分子”，这种看法是值得討論的。

要判断一个社会集团是否是新階級的萌芽，首先應該考查这个社会集团或个人的生活方式和他們的生產活动，即是說要首先考查他們是否是新生产方式的体现者。根据这个原則来考查紫荊山的燒炭工人，那末認為它是“萌芽无产階級分子”的論点，是不能成立的。請看下面關於紫荊山燒炭者的史料：“全区村疏人少，生活困苦，居民仅及数百家，几全是康熙年間由广东迁徙至此而开荒闢土的客家人，……其地林木丛生，居民散居山边溪畔，間或闢地耕田，燒炭及制造木具山貨为生”。^④“新村是平隘山一小部分，乃入木山乡（雋山）的路。……平隘山很苦，住在那里的十有七八以燒炭过活”^⑤。“鵬隘山与十八山相連，太平天国起来前，多居客家人，他們或打山（耕山）或燒炭”^⑥。这些資料說明了紫荊山一帶的地理环境，人們在这种环境下如何从事生产和生活的状况。透过这些資料使我們看出：这些由广东迁徙至此而开荒闢土的客家人，正是前述“奸民潛入搭棚开垦”的队伍。他們用自己

① 教学与研究，一九五七年二期頁十二至十三。

② 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頁十六。

③ 列宁全集第一卷頁二七七。

④ 簡又文：“太平軍广西首义史”頁一一二。

⑤ 罗尔綱：“忠王李秀成自傳原稿箋証”頁三八。

⑥ “太平天国起义調查报告”頁三八。

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于“开荒闢土燒炭及制造木具山貨为生”。这样的个人或集团，显然是附属于山地的小生产者，正如平原上的农民佔有小块土地，用自己简单的生产工具从事生产活动一样。所以，燒炭“工人”只是各自謀生的小生产者，并不是什么“萌芽的无产阶级份子”，“楊秀清家很穷，在鵬隘山燒炭挑往新圩等处去卖，現在十八山里，有一个叫炭窖冲的，冲內有成百成千的炭窖^①。这种生产活动正是經濟落后山区存在的普遍情况。难道一两千年以前沒有这样的炭窖嗎？难道一有这样的燒炭“工人”就說明什么資本主义生产因素的来由嗎？

由于他們的生活极端貧困，特别是銀貴錢賤之下，他們卖炭收入（以錢計价）的日益減值，这就决定了他們要求改变現狀的强烈愿望。从这些事情出发，我們認為楊秀清蕭朝貴作为农民阶级的代表和領導，是純樸的偉大的，用不着任何渲染。可是有的史学工作者，为了說明自己論点的新奇，硬要将他两人装扮成“萌芽无产阶级分子”的傑出代表，这是完全不必要的。历史的真实，是不会被那毫无依据的假想所改变的。

二、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問題

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革命的土地綱領和建国的根本大法，它反映了这次革命斗争总的要求，也反映了这次革命运动的性質，因而对它的內容和实質进行分析和评价，是很必要的。

有的史学工作者認為：“天朝田亩制度实質上是一个彻底的反封建地主所有制的农民资产阶级性的土地綱領，革命性和进步性是它的基本特征，它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帶有任何反动的实質”^②。有的則認為：“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和平民反对派矛盾的产物”，說它既規定了农民阶级要求的絕對平均主义的分田办法，也規定了平民反对派提出的立即廢除私有财产的主張”^③。有的同志則在这个綱領中去寻找那些是帶有或反映了资产阶级性質的文句^④。也有的同志在肯定这个綱領在实际革命中起了巨大的积极作用的基础上，指出这个綱領“但是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他們企图把小农的土地所有制巩固起来，这在实質上是帶有反动性的”^⑤。在上述这些不同論点中，有下列几个問題值得商討，即（一）对天朝田亩制度实質的估价，（二）提出这个綱領的阶级基础和它的性質。对这些問題，笔者提出自己的初步看法。

我認為在考查天朝田亩制度的实質时，不仅要考查它在当时实际革命斗争中所曾起过的巨大的历史作用，而且也要考查它本身具有的經濟思想的实質，只有这样，才能給这个綱領作出全面的实事求是的估价。

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們：根据“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則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飽煖矣”的原則，描繪了未来所要建立的美好社会图景：“有田同耕，有飯同食，有衣同穿，有錢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飽煖”的社会。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

① “太平天国起义調查报告”頁三八。

② 教学与研究：一九五七年第二期頁十。

③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一九五七年三期頁八十一至八十三。

④ 历史教学問題：一九五九年五期頁五十至五十二。

⑤ 范变淵：“紀念太平天国起义105周年”。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一日。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則迁彼处，彼处不足則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則移彼丰处以賑此荒处，彼处荒，則移此丰处以賑彼荒处”，具体办法：“凡分田，照人口，不論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則分多，人寡則分寡，……。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上，受田多，踰十五岁以下一半……。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績縫衣裳。凡天下，每家五母雞，二母彘，无失其时。凡当收成时，两司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則归国庫。凡麦豆苧蔬布帛雞犬各物及銀錢亦然……。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具用国庫，但有限式，不得多用一錢”。又規定“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在規定平分土地和公有财产物以及农业和工业結合的基础上，天朝田亩制度还規定了二十五家作为基本細胞的社会經濟政治軍事組織单位。即“有警則首領統之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則首領督之为农，耕田奉上”^①的守土乡官制。从这些具体内容可以看出；天国革命的英雄們不仅企图使軍事和行政統一起来，而且还企图将每个社会基层組織改造成自成体系的經濟单位，企图使它变成一个农业与家庭手工业强固結合的农村公社。这个綱領的提出，充分地反映了农民几千年来要求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得到解放，过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的强烈愿望。正因为如此，所以它在动員和鼓舞广大农民羣众参加革命行列，向封建势力和封建制度进行冲击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这种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綱領，如果从它的实际后果来考查，对当时中国社会萌芽了的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因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它的进步性是主要的。这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理想，固然一方面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更重要的是这种經濟思想和企图，也是与当时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背道而馳的。所以它在實質上帶有反动性。人民日报在紀念太平天国百周年的文章中指出：“太平天国的領袖們終究只能从农民階級的狹隘的眼光出发，画出了一个平均主义的图案，按照这种图案，每一农家均应平等地保有一定的土地与一定财产，使得大家仅仅能够生活下去。这种图案是不可能实现的，而且这种图案并不是为着使社会生产力向前发展，却是使社会生产力停滯在分散的小农經營的水平上的。因此这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實質上是帶有反动性的”。这个論断，我們認為恰恰反映了农民階級革命性和階級局限性的辯証規律。恩格斯指出：“在形式的經濟学意义上說是錯誤的那种东西，在全世界历史意义上說也許是正确的”^②。列宁在分析俄国民粹派的土地綱領时也指出：“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形式的經濟学意义上說是錯誤的，而在历史意义上說，却是正确的，但它之为农民羣众所进行而由历史規定的特殊民主主义的表現，却是正确的，这个斗争是資產階級革命事业不可缺少的要素，同时又是这一改革事业完全胜利的条件”^③。根据上引馬列主义經典作家的指示和对天朝田亩制度的具体分析，我們認為那种将天朝田亩制度說成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不帶有任何反动實質的論点，是片面的，因为他将这个綱領在实际革命斗争过程所起的作用和它的客觀历史作用，与这个綱領本身具有的經濟思想的實質，混淆起来了。

在对天朝田亩制度的作用和實質作了如上的評述后，現在就應該論討这个綱領的階級基础，具体的說，农民是否能提出这个綱領？我們認為，一个革命政綱的提出，应当是反映这

① 中国近代史資料叢刊：太平天国第一冊頁三二一至三二二。

② “列宁文选”两卷集卷一，頁八一四。

③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一卷頁八一五。

个社会当时存在的基本矛盾，并企图以革命的手段来解决这个矛盾。天朝田亩制度就是这样的革命政綱。上面已經論述了太平天国革命前夕中国社会的基本經濟結構，是封建生产關係佔統治地位的經濟結構，土地問題是当时的基本問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是当时存在的基本矛盾。天朝田亩制度就是在这个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的。

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从秦末陈胜吳广领导的农民战争起，到太平天国革命运动止，二千余年大小数百次的农民战争，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农民要求在政治上經濟上得到解放的强烈愿望，虽然他們在起义的初期沒有提出較為明确的綱領，但起义的本身就是充分地說明这个事实。同时农民运动的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进步。唐以前的农民战争，侯外卢同志指出：“在这一时期的农民战争，农民在爭取生存权的同时，要求财产公有，要求撤除那些直接压在他們头上的官厅的特权，要求廢除特权階級的靡費。在爭取人权的同时，要求人与人之間的平等，要求人人同等劳动。这种‘太平’的思想，頗类似于恩格斯說的原始的财产公有，共同劳动的狂暴空想”^①。唐末王仙芝起义时，自称“天补平均大將軍，即以有余补不足的平均主义的思想。北宋初王小波起义号召羣众說，“吾疾貧富不均，今为汝均之”^②。方腊领导的农民軍，提出了“是法平等，无有高下”^③的朴素民主思想。南宋鐘相起义的口号是“法分貴賤，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貴賤，均平富”^④。明末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軍，提出了“貴賤均田”，“公平交易”的主張。这些史实說明了要求政治的經濟的解放，是他們长期斗争的目标，但又由于階級的局限性而富于空想，因而他們提出了政治上平等經濟上平均的朴素的斗争号召。太平天国革命将这种旧式农民战争推上了最高峯，提出了农民階級可能提出的明确綱領。侯外卢同志指出：“从明末农民起义的均田思想到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脈絡相承的历史傳統，是后期农民战争的最高綱領。我們必須指出，二千余年农民階級用血肉写成的「大同世界」是被压迫階級在整个人类階級斗争中的有机“炼环”^⑤。又說：“天朝田亩制度是总结了中世紀农民要求的偉大政綱”^⑥。从历史背景看来：绝对平均一切財富的心理和绝对平等的思想，是閉塞无知的被压迫被剝削的农民階級本能的思想。毛澤东同志指出：“绝对平均主义的来源和政治上的极端民主化一样，是手工业和小农經濟的产物，不过一則見之于政治生活方面，一則見之于經濟生活罢了”^⑦。斯大林同志也指出：“平均主义的根源，是个体农民的思想反映，是平均派分一切財富的心理，是原始农民共产主义的心理”^⑧。根据上述論証，我們認為天朝田亩制度的提出，是几千年来农民斗争的产物，是农民階級能够提出的綱領，是农民向封建地主作斗争的綱領。那种認為太平天国“提出的基本思想如平等，消灭階級差別，消灭私有财产，建立地

① 侯外卢主編：“中国历代大同理想”頁一五。

② 全上書 頁一九。

③ 呂振羽：簡明中国通史下册（50年版）頁一九四。

④ 侯外卢主編：“中国历代大同理想”頁一九。

⑤ 侯外卢主編：“中国历代大同理想”頁二二。

⑥ 全上書 頁三四。

⑦ “毛澤东选集”（普及版）卷一頁九三。

⑧ 斯大林：与德国作家路德維希的談話，人民出版社頁十七。

上天堂”^①与农民思想格格不入的論点，是毫无根据的主观臆断。至于那些在天朝田亩制度里找那几条是反映或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的論点，也是不正确的。因为“农民要求土地是根据农民阶级的本能意識出发的，它只是自发的要求土地，并没有任何多少确定的經濟概念同土地轉归人民一事联系起来。农民祇有业已完全成熟，业已历尽千辛万苦并經多年压迫所鍛炼出来的要求，就是要求革新，巩固加强与扩大农业，想使小农业成为佔有統治地位的农业，不过如此罢了”^②。那些同志的錯誤不仅在于他們沒有依据上述列宁的指示認識天朝田亩制度，而且还在于他們将时代付与这个綱領新的内容和意义与这个綱領本身的内容和实質等同了。再如那些持“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阶级与平民反对派矛盾的产物”論点的同志，除犯了上述同样的錯誤以外，更重要的还在于他們将“燒炭工人不分清紅皂白的都戴上了萌芽无产阶级份子的帽子”，将楊秀清，蕭朝貴装扮成萌芽无产阶级分子的代表，于是制造出平民反对派要求公有制，农民要求私有制，天朝田亩制度“既規定了农民阶级要求的絕對平均主义的分田办法，也規定了“平民反对派提出的立即廢除私有财产的主張”。这个論断是完全不能成立的，因为他所謂的阶级矛盾是沒有根据的，燒炭工人并不是什么萌芽无产阶级分子，楊秀清蕭朝貴并不是什么萌芽无产阶级分子的傑出代表，而是偉大的农民領袖。

三、太平天國革命的性質問題

根据上述对太平天国革命时中国社会的基本性質；革命的动力和領導；革命的对象和革命任务以及集中反映这次革命性質的革命政綱的分析，我們認為这次革命的基本性質，仍然是一个沒有先进阶级領導的單純农民革命战争。毛澤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書中指出：“从秦朝的陈胜吳广，項羽刘邦起，一直到清朝的太平天国，总计大小数百次的起义，都是农民的反抗运动，都是农民的革命战争”。并进一步指出这些农民革命战争虽然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只是由于当时还没有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生产关系沒有新的阶级力量，沒有先进的政党，因而这种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得不到如同現在的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領導，这样当时的农民革命总是陷于失敗”^③。毛澤东同志在这里給太平天国革命的基本性質作了精確的論述。人民日報在它紀念太平天国革命百周年的社論中指出：“太平天国是旧式的农民战争——沒有先进阶级領導下的农民战争发展到的最高峯”。

但是由于当时的中国，已經不是完整的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开始进入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在这个社会里，既有資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又有外国資本主义的侵略。外来的侵略势力和国内封建势力开始干着里应外合的勾当，阻碍着中国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太平天国革命給国内封建統治势力的严重打击和它所給予外来侵略者应有的惩罚，客观上为中国資本主义的发展开闢了道路。因而它实質上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的革命序幕。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爆发的以反封建反外国資本主义侵略为其革命任务的农民战争，不管起义的本身“帶有何种宗教的，朝代的或民族的形式”^④，但它終究是时

① 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三月号頁十七。

② 列宁：俄国社会民主党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俄国革命中的土地綱領：頁九三。

③ 毛澤东选集（普及版）第二集頁六一九。

④ 馬克思恩格斯論中国頁四〇。

代的产物，因而它在实质上不能不带有资产阶级革命的特征。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一书中指出：“这个第一步的准备阶段，还是自从一八四〇年鸦片战争以来，即中国社会开始由封建社会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以来，就开始了的。中经太平天国运动，……直到今日的抗日战争，这样许多个别的阶段，费去了整整一百年工夫，从某一点来说，都是实行第一步，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的时间中和不同的程度上实行第一步，实行反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为了完成第一个革命而斗争。而辛亥革命，则是在比较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①。从毛泽东同志这一指示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将这次农民革命放在民主革命的范畴来考察的，将它看作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准备阶段。但毛泽东同志并没有将这次革命看作是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因为完全意义上的民主革命是从辛亥革命开始的。而且辛亥革命以前的各次革命所具有的民主革命性质的程度，是要根据具体历史条件进行具体分析的。持单纯农民战争论点的同志，显然忽视了太平天国革命所处时代的特点和毛泽东同志根据这一特点作出的理论指示，因而他们的论点就不能全面表达出这次革命所包含的丰富内容和时代特点，这实质上是对这次革命运动的意义和作用估计不足。持“资产阶级性质农民战争”论点的同志们，其错误在于他们夸大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他们对当时中国还没有具备建立资本主义的物质条件，避而不谈。而把经济发展不同程度国家的农民战争等同起来。这样他们就不能不将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这次革命运动的基本性质是农民革命运动的精确论点抛弃。把列宁同志的“凡是全部社会经济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条件下发生的反中世纪制度的革命，都是资产阶级革命”^②的正确论点，硬搬来为自己的论点辩护，这显然是对经典著作的歪曲，其结论当然是错误的。我的意见是：太平天国革命从中国当时基本上还是一个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基本性质，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是当时的基本矛盾，而革命的后果并不是直接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到来等等方面来考察，它的基本性质是单纯农民革命。从这次革命所处时代的特点，和它揭示了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序幕以及为当时萌芽的资本主义生产开辟道路来考察，它又带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也就是说：太平天国革命是一次带有资产阶级革命性质的农民革命。

① 毛泽东选集（普及版）页六五九至六六〇。

② 列宁：社会民主党在一九〇五年至一九〇七年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纲领页一六〇。